

东北亚变局视域下《俄日下田条约》的再审视

邢媛媛

(中国社会科学院大学历史学院, 北京, 100102)

摘要: 从 1697 年俄日关系启幕至 1855 年《俄日下田条约》签订, 两国早期关系历经一个半世纪的演变。1815 年, 两国在平息军事冲突和解决人质危机后相互默许边境划分构想, 为缔约奠定了历史基础。1852 年, 俄日关系的相对稳定状态随着东北亚局势变动被打破, 为缔约创造了现实条件。两国在谈判中以退让促成和解: 俄国以土地让步争取到日本开港通商, 政治利益让渡给经济利益; 日本则以开港通商保全国体, 经济利益让渡给政治利益。妥协性是《俄日下田条约》的突出特征, 揭示了条约的实质和俄日早期关系的本质。对俄国而言, 《俄日下田条约》是因殖民竞争中的力所不逮而在东方采取的权宜之计; 对日本而言, 则是避战止戈的近代外交尝试, 是幕府逐渐放弃锁国的主动对外探索。

关键词: 俄国; 日本; 普提雅廷; 川路圣謨; 《俄日下田条约》

中图分类号:k313.4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672-3104(2023)02-0200-15

俄国与日本处于两种不同的文化分布区且以海洋相隔, 在欧洲殖民帝国成长时期, 两国才开始有交往。17 世纪末, 俄国征服西伯利亚后, 扩张步伐到达中国东北和鄂霍次克海沿岸。而东亚一隅的日本, 其德川幕府紧缩对外政策, 漂流民成为俄日产生联系的必然媒介。1697 年, 俄国军官 B.B. 阿特拉索夫远征堪察加, 与日本漂流民传兵卫“不期而遇”, 俄日关系由此启幕。“扩张”与“紧缩”两种截然相反的外政方针培育出的俄日关系, 在各阶段都带有深刻的时代烙印。跟随两国关系走向, “南下”与“北上”成为俄日新格局。历经一个半世纪的交往, 两国于 1855 年在日本下田签订首个双边协定——《俄日下田条约》(日本又称《日俄亲善条约》, 以下简称《条约》)。《条约》是两国关系史上的里程碑, 标志着双方近代性质外交关系的开始。从世界历史的长时段来看, 这一时期的俄日关系, 对于俄日两国本身和东北亚历史发展的影响都是巨大的。

《条约》是引领日本进入国际条约体制的先

锋条约之一, 其重要性不言而喻。国际上对《条约》评价不一, 长久以来大体存在“日本受压论”(日本学界)^[1-4]与“俄国受压论”(俄国学界)^[5-7]两种观点, 这主要是囿于研究者各自立场所致。中国学者普遍支持“日本受压论”, 认为该条约是欧洲列强强迫日本签订的不平等条约^[8-12]。随着史料不断呈现和史观逐步修正, 历史工作者开始重新思考传统观点, 已取得一些重要成果^①。受此启发, 笔者认为, 在俄日缔约的历史动因与现实原因、两国的外交博弈和利益权衡尤其是主导国俄国的战略考量等事关条约特征和实质的关键问题上, 相关研究仍有可挖掘的空间。

本文以早期俄日关系的历史演变为铺陈基础, 结合对两国不同诉求的综合研判, 力图从更加深广的视野考察《条约》, 以期得出较为客观的评价。笔者认为, 《条约》是俄国与日本在东北亚的利益产生激烈对冲时双方退让与和解的产物, 是俄日两国在事关国家重大利益面前采取的理性、积极的互利措施, 其积极性就在于妥协

收稿日期: 2021-12-06; 修回日期: 2023-01-26

基金项目: 国家社科基金一般项目“东北亚视阈下俄日关系与中国因素的历史研究(1701—1917)”(19BSS046)

作者简介: 邢媛媛, 女, 湖北当阳人, 历史学博士, 中国社会科学院大学历史学院副教授, 中国社会科学院世界历史研究所研究员, 主要研究方向: 俄国史、国际关系史, 联系邮箱: xingzun@163.com

性。妥协性显示出条约的实质和俄日关系的本质，预示着两国更加复杂的未来发展进程。

一、《条约》签订的历史政治基础

从俄日两国开始交往到 1815 年第一次边境协议的相互默许，两国关系初步建立并形成相对稳定态势。两国在利益相关区域的冲突与和解为最终缔约奠定了政治上的基础。

(一) 17—18 世纪俄国向东扩张与俄日早期关系的建立

18 世纪末的东西方世界已明显呈现不同的发展态势。发端于英国而席卷西方的产业、政治和科技三大革命浪潮使东西方力量对比产生巨大落差。西方列强为进一步开辟海外市场，纷纷扩大对东方的侵略，加快敷设东北亚市场^[13]。曾偏居东欧、社会发展被顽固农奴制所羁绊的俄国，沦为西方的“二等强国”。纵是如此，俄国国际地位却扶摇直上。俄国自彼得一世欧化改革走上强国征程后，高度参与到海外贸易、殖民竞争的国际事务中。叶卡捷琳娜二世改变北方体系中以国别或集团决定亲疏的旧思路，转变为以国家利益作为国际关系的出发点。亚历山大一世充分把握法国对外扩张造成的欧洲特殊形势，成为反法同盟盟主和欧洲宪兵。这都使得俄国凭借强悍的政治资本积极跻身于西方殖民狂潮中，力图在大国行列中占据一席之地。

浸润在强大生产力的西风东渐之下，中国、朝鲜等朝贡体系内的成员国被动应付，长期游离于朝贡体系外的日本亦难以幸免。18 世纪末 19 世纪初的日本是世界上极为封闭的国家，对外限制与对内权力垄断严苛。随着俄国开始来到虾夷地，日本知识分子纷纷提出开发北方诸岛、御敌与殖民构想。在世界形势急骤演化的大变局时代，东方国家面临着双重任务：首先是遏制西方侵略，维护国家独立和民族尊严，其次是迎接西方先进生产力和生产关系的挑战，发展本国生产力。从世界历史进程来看，日本无疑是做得比较成功的^[14]。

在俄日早期关系的形成过程中，俄国毋庸置疑居于主导地位。1689 年，《中俄尼布楚条约》

成功遏制俄国向黑龙江流域深入，迫使其侵略触角向北迂回^[15]。对日本的早期认知得到传兵卫验证后，因缺乏天然良港和强大海军的内陆国俄国陆续向陌生的太平洋派出多个“考察队”和“使团”，以“和平友好”手段展开对日交涉，妄图变日本为稳定的物资供应基地。因此，疯狂殖民的俄国与加强北部边防的日本，发生冲突是必然的。

И.П.科济列夫斯基远征队(1711—1713)等完成前期“寻日”之旅^[15]。М.П.什潘贝格与 B.瓦尔顿(1739)几乎同时发现日本，И.切尔内(1766)与 И.М.安季平(1778)已详细勘测至少 22 个千岛岛屿，将实际俄占领地推进到择捉岛，逼近松前藩。Я.Э.拉克斯曼首届官方使团(1792)与 Н.П.列扎诺夫环球使团(1803)实现与幕府高层的接触，均遭“锁国祖法”拒绝，俄日冲突一触即发^[16]。1808 年 7 月 18 日，俄国外交大臣 Н.П.鲁缅采夫向亚历山大一世上呈建立对日贸易的报告，特别指出占领库页岛的重要性^②。同一时期，俄中贸易受阻，俄国强烈希望与日通商，南下势头猛烈。1805—1813 年，Н.А.赫沃斯托夫与 Г.И.达维多夫、В.М.戈洛夫宁多次武装侵扰南千岛，直接威胁幕府安危而遭抵抗，戈洛夫宁被捕^[17]。

日本幕府对北部地区的两次大规模勘察(“虾夷地考察”)都集中在 18 世纪后半期：1785—1786 年和 1798—1799 年。这一时期也是日本历史上开始对国土防卫给予“深切关注”的年代。北部地区研究者高桥景保曾指出，这涉及的不仅仅是与俄国的领土划分，还有同中国的领土划分。他建议，为确立边界和消除外敌，必须将库页岛置于统治之下^[18]。他的看法加重了日本对俄国的担忧与警戒。幕府在考察后以占领、安抚、怀柔、同化的西方模式有计划地管理虾夷地，以提高北部军事存在。1799—1807 年，幕府相继将东、西虾夷收归天领^③。北部防务起初由地处本州的南部、津轻两藩负责，之后则由会津及仙台两藩随时待命协防北方诸岛。1808 年初，日本出台针对俄船令：无论俄船出现在哪个港湾，都要尽力将其驱逐出日本水域，但不允许武力交锋，应选择与每一个具体形势相适应的有效措施，尽量不损害政府威信。随着日本北部防务的落实，俄日缓

冲地带日益被压缩。

被称为“第零次俄日战争”的幕末军事冲突直接影响到两国在千岛的实力对比。松前藩总督荒尾茂明支持释放俄俘，他认为，继续扣押人质会增加开战风险，对国家产生不可预料的后果^[19]。1813年，戈洛夫宁被释，日本转交拒绝贸易的禁令，警告俄国“以后若还想做贸易就别靠近日本海岸”。双方在处理人质的外交斡旋中均萌生划定边界的想法，以避免类似事件再次发生，俄方提出在得抚岛与择捉岛之间划界^[20]。这一年伊尔库茨克总督H.I.特列斯金写信给虾夷长官，建议得抚岛为中立区和贸易区^[21]。幕府则指令：

“确保择捉岛归日本所有，得抚岛及其周边小岛是无主领土，从得抚岛北边第一座大岛新知岛开始归俄国所有。”^[22]但日方复函未及时送达俄方。1815年10月20日，特列斯金发布禁访千岛第18岛(得抚岛)以南日占岛屿的命令^{[23](85)}。从俄国撤退得抚岛驻扎人口、发布航行禁令的举动，可理解为其对日本领有择捉岛的默许，满足了日本曾经在人质交涉中提出的边界设想。俄日持续八年的军事冲突，以戈洛夫宁获释、双方默许边界而圆满解决。虽然俄国长达百余年追求与日通商的努力无果而终，但两国关系暂时稳定下来。俄美公司因千岛殖民地衰败而无利可图^④，将重心移至美洲，俄日交往就此中断，直到40年后俄国海军E.B.普提雅廷使团赴日。

在人质调解中，戈洛夫宁关于“得抚岛和择捉岛之间划界”的提议在俄国成为被普遍接受的观点。两国尽管未举行外交会面，但有一个事实不容忽视，即俄国“已经有意愿承认日本对择捉岛及南部岛屿的主权了”^[16]。贸易问题上，一方面，幕府反对任何贸易形式，但另一方面也不完全拒绝，因为边界划分涉及日本对择捉岛的属地主权^{[23](151-153)}。俄日两国对边界协定的暗许既维持了和平与边界稳定，又为缔约谈判积累了经验，提供了良好的政治保证。1853年，尼古拉一世对赴日使团训令中隐藏的“以国界划分为诱饵、以土地作让步”的策略即源于此时的外交斡旋。

(二) 早期俄日关系形成稳定态势的原因

从俄日双方默许边界到1853年普提雅廷使日，两国维持近40年的稳定关系。俄日关系的

稳定态势是诸多力量综合作用的结果，主要原因在于双方实力对比和对国际局势的战略考虑。

地缘因素是俄国外交传统的关键基因。首先，俄国的传统势力范围和核心地缘利益始终在欧洲东部的斯拉夫人聚居地。虽然同东方日本的通商与建交是既定方针，但此时的欧洲大厦在资产阶级革命冲击下飘摇不定。俄国为维护沙皇的绝对君主专制，不得不放松对远东的关注而忙于欧洲事务。与拿破仑签订《提尔西特条约》(1807)后，俄国必须承认法国在德国的占领地以及法国修改的疆界，同意成立华沙大公国(这是法国在俄境上的一个进攻基地)，并参加“大陆封锁”。俄法同盟于1809年入侵瑞典、割占芬兰，掉头南下继续与土耳其作战，割占东部摩尔多瓦。俄法同盟破裂后，拿破仑一世于1812年6月率大军渡过涅曼河对俄不宣而战，俄国投入反侵略自卫战争中。如此形势不允许俄国以强硬姿态回应日本。其次，俄国领土庞大，国库因扩张和内战损耗殆尽，虚弱的国力难以支撑庞大帝国的开支，尤其是在必须跨越西伯利亚(东欧至远东)漫长而艰险的陆路交通线的情况下。沿线的信息传递、物资输送、军队派遣与集结都存在巨大困难。西伯利亚是俄国“没有屋顶的大监狱”，大量流放犯被投放于此，有限性扩张使被占区统治基础不稳和地方反抗力量不断^[24]。比较而言，幕府派往北方的军队则拥有绝对优势，几乎可以认为是本土作战。交通便捷能够保证战略补给的及时、有效与灵活性，日本的地缘优势远胜于俄国。因此，默许边界以稳定远东是此时俄国的最佳选择。最后，维也纳会议促成相对稳定的欧洲局势。《第一次巴黎和约》(1814)、《维也纳条约》(1815)、《神圣同盟条约》(1815)与《四国同盟条约》(1815)保证了俄国在反法战争中的既得利益。新的领土、均势和平体系及国际交往新原则客观上制约着俄国的扩张步伐。正是在1815年，俄国发布从南千岛的撤退令。1831年波兰起义、1833年干预土耳其-埃及冲突、1834年高加索起义，这些都使得俄国无暇顾及处于“遥远东方”的日本。

锁国中的日本此时也经历着剧变。国内，俄国南下加剧社会思想解放，加速兰学传播；财政危情频发^[25]。国外，欧洲船只频繁冲击日本海岸，

并大量闯入日本海^[26]。英国“菲顿号事件”(1808)对幕府是一个沉重打击。为缓解国内外危机，幕府加强锁国力度，因为只有圆满、体面解决“俄国问题”，才能给类似事件提供参照。1825年幕府出台《文政驱逐令》，将对俄船的打拂令扩张及所有外船。

俄国从日本抽身、日本加强海禁，俄日关系的稳定态势为最终缔约创造了历史基础，播种下妥协与和解的种子。

二、《条约》签订的关键动因

两国维持近40年的稳定被俄国首先打破，1852年E.B.普提雅廷使日，标志着俄国对日政策的重大调整。访日前夕成立的专司远东问题的亚洲事务委员会，为两国缔约谈判酝酿着最后的“火候”与最佳“机缘”。

(一) 普提雅廷使日的背景

19世纪中期，欧洲各国的矛盾激化使它们在亚洲的利益冲突不断升级，殖民地竞争成为欧洲战争的蔓延，太平洋被拖入世界经济体系。随着欧美国家竞相划分势力范围，势不可挡的扩张趋势无疑刺激着俄国必须重拾并强化被搁置多年的对日交涉，俄日两国稳定状态逐步失衡。

至少从18世纪下半叶起，俄国远东政策就已遭遇英法在东亚蓄谋带来的威胁。面对西方蜂拥而至太平洋的新情况，俄国连续颁布特许状以保障美洲属地利益。1821年9月4日的亚历山大一世法令中，俄国将特权范围确定为从阿拉斯加湾海岸北纬51°开始，直到择捉岛南岸北纬45°51'的长达1852千米海岸线^{[27][27]}。几乎同时(9月13日)出台的《自此后二十年给俄美公司的特权》指出，俄国有权将上述经纬度界限之外的地区“纳入俄国属地，若没有被其他欧洲民族或美利坚合众国占领、不隶属于他们的话”^{[27][41]}。实际上，该法令完全无法推行，因为俄美公司经营不善，物资配给极度缺乏，殖民地连粮食都连年短缺，更何谈对外扩张。因此，俄国分别在1824、1825年与美英立约，将势力范围收缩至北纬54°40'，并允许英美船只在十年内进入该线以北^[28]。这意味着，俄国放弃对北上美洲的新领土要求而

南下专攻日本。

一直以来，英国在亚洲获取最根本经济利益的对象是中国，此时，它也把目光瞄准“人口和政治威望仅次于中国”^[29]的日本。美国亦对日本表现出“异常兴趣”，其“半路出击”对欧洲与东亚国家关系造成严重干扰，成为俄日关系中不可忽视的影响因子。建国后国力急剧膨胀的美国是最积极要求日本打开国门的，甚至“刻不容缓”。由于担心其他国家在日本占优势的影响力会严重削弱其既得利益，对日本无所作为40年的俄国于1852年成立亚洲事务委员会，专补远东“漏洞”。Г.И.涅韦尔斯科伊在四十年代的考察证明库页岛是一个岛，这也敦促尼古拉一世加强俄国对太平洋岛屿的争抢^{[30][19]}。中英第一次鸦片战争的巨大冲击波震荡日本，促使幕府更加重视海洋安全^[31]。“为避免像中国那样受到国外武装入侵”^[32]，幕府废除“文政驱逐令”(1825)而实行“薪水给予令”(1842)。从“驱逐”到“给予”，意味着外部形势变化不仅对幕府应对提出新要求，也向追逐对日贸易的俄国提出了紧迫任务。日本政令之变恰恰为外国使团来航创造了客观条件。

1852年初，俄国获取美国筹备赴日使团的重要情报，急速派遣普提雅廷去日本。普提雅廷是一位老练的外交家，十分坚定地支持俄国与日本、中国建立更密切的往来^[33]。他认为：“寻找一个比鄂霍次克更方便的港口，与堪察加半岛和我们的美洲殖民地进行交流本身并不是没有意义的。”^{[27][12]}沙皇要求使团既要观察美日互动反应，同时还要接受国内指示不断调整对策^[12]，设法“使日本理解”：“两国建交通商对日本是有益的，日本人也可以在俄国领土上自由贸易。俄国仅希望在日本北部拥有一个合适港口便于通商及逗留。”^⑤

与欧美不同，于俄国而言，同日本确定边界可以有效避免第三国蓄意侵犯接壤领土，这些领土在俄国眼中就包括库页岛与千岛群岛。因此，远东边境与经贸的双重安全在俄国得到前所未有的重视^[34]。1852年10月7日，普提雅廷带着沙皇国书，率领“帕拉达”号驶向日本。

荷兰对打开长崎以外的日本港口一直抱有

兴趣。自1844年提议缔结日荷条约的尝试^⑥失败后,荷兰期望借助俄国来达成目的。效命过荷属东印度公司的Φ.Φ.西博尔德是曾旅居日本的著名欧洲人、日本学专家^[35]。1852年11月8日,他获荷兰总督Д.К.波特支持,向俄国提交建立俄日关系的方案,“为避免武装冲突,未来必须将两国在库页岛和千岛的界限确定下来”^[36]。12月25日,涅谢尔罗德总理邀请他到圣彼得堡,西博尔德的建议成为俄国给普提雅廷训令的重要附加部分,也为俄日贸易方案提供了蓝本^[36]。1853年7月,普提雅廷在驶往江户途中收到俄国信使带来的至关重要的文件,即1853年2月24日尼古拉一世的“训令”与附加的“释义”^⑦,该“释义”即根据西博尔德的建议而写成。

(二) 沙皇“训令”的内容

沙皇“训令”的主要内容包括俄日谈判的总体思路与具体策略:“与日本谈判时必须使用和平手段。我们要向日本提出通商、俄船停泊日本港口的提案。此外,立即提出国界问题是完全有必要的。国界提出来,日本便不得不与我们交涉。我方利用这个问题,可以使日本作出更多让步。对于国界划分,在不损害俄国利益的范围内,尽可能作出宽大处理,具体事宜可以视情况而定,因为通商带来的利益对俄国来说,才具有伟大意义。库里尔群岛中,属于俄国最南端的岛是得抚岛,我们会把它作为俄国属地的最后一站,不超出这个范围……对我们而言,这个岛南端曾经是(事实上现在也是)与日本的分界线。从日本方面看,界限是择捉岛北端……如果日本提出对得抚岛的主张,则应向他们说明,在俄国地图中,该岛都标记为俄国领土,俄美公司在阿拉斯加及库里尔群岛等地拥有管辖权,并且也有当地住民作证。这是证明其为我国领土的最好证据。你们可以宣布,得抚岛南端……是我们在库里尔群岛属地的分界线。”^⑧在库页岛问题上,尼古拉一世提到:“萨哈林对我们有特殊性,是通往阿穆尔河的重要据点……拥有这座岛的强国将拥有阿穆尔河的门户。任何获取国都将成为日本近邻,对于日本来说……与几个世纪以来没有贪欲的俄国为邻,应该是有益且安全的。”^⑨

从“训令”中可以看出,普提雅廷此行目的是与日本建立商贸关系,为俄国打开东部港口,确定库页岛归属权和千岛群岛上的国界。但从18世纪初俄国开始寻找日本航路起,上百年的交涉让俄国有一种比较清醒的认识,即与日本同时达成开港、通商的共识远非易事。两届使团均遭幕府拒绝,赫沃斯托夫与达维多夫侵扰北方反遇日本顽强抵抗而引发交战,戈洛夫宁被囚异乡是俄人心中无法挥之的噩梦。这可以理解为,日本对俄国的拒绝在“晋级”。日本早在40年前的1815年就已向俄国下达最后通牒:以后若还想做贸易,就别靠近日本海岸。但仍在那年,俄日双方对国界协定的初步默许又留给接连碰壁、一筹莫展的俄国一线希望。俄国汲取历史经验与教训,为打破僵局只能另辟蹊径。开门见山地直接谈贸易或许让日本不能接受,因为这与其坚守的“祖法”相背离,只能尝试以领土交涉为切入口转移日本的注意力,采取迂回之术让谈判逐步靠拢俄方设想。因此,“训令”的字里行间透露出两级策略:以国界为钓饵,以土地做让步。首先,使用和平手段意味着排除武力攻取之道,以友好之态引日本走向谈判桌,国界划分是最佳诱饵。对南千岛和库页岛的“既成事实”是俄国提出领土划界的根据。40年前唯一可被称为“经验”的国界初步划分使俄国心存一份笃定,日本至少不会立刻拒绝谈判。其次,俄国要立足远东,必须拥有能在太平洋上持久经营的稳固后方,这个后方急需港口与资金(通商)来武装。经济利益对俄国是第一位的,“通商”是普提雅廷此行的首要目的,而通商的前提是开港。为达目标,必要时在领土上适度让步、“宽大处理”,以换取日本开港与通航,这对在远东缺乏出海口的俄国来说不失为上上策。同时,“具体事宜视情况而定”也意味着沙皇给普提雅廷放权,在处理具体事宜上自主把握灵活性。可见,相对于开港与通商,与日本的领土纠纷反而不那么重要了。

(三) 沙皇“训令”附加“释义”的内容

随沙皇“训令”附加的“释义”以与日贸易方案为主要内容,成为俄国与日本的最早贸易实践。结合政府的注解来看,“释义”很大程度上

吸收荷兰的贸易体验，荷兰在俄日关系中的中间角色由此窥见一斑。

“释义”第四点提到日本政府完全领有俄国属民和荷兰公民居住或存货之房屋的相关情况。注解如下：在长崎为俄国商馆选址时，西博尔德称，“最合适的地方应该暂时落在列扎诺夫曾经的使馆里”，但“洋行现在应该有更大的空间”，

“虽然荷兰人为荷兰洋行所占之地付给日本政府一定数目的钱(类似于土地出租)，但我们还是希望能为我们腾出点完全属于自己的地方。也许，俄国商馆应该与荷兰商馆持同等立场，以及日本政府不应该干涉我们这里的内部秩序，这才是有利的”^⑩。

“释义”第八点提到对俄国商人和江户、大阪、京都和长崎的特权商人开放贸易。注解如下：在西博尔德看来，以幕府官吏(国库专员——作者注)为中介，上述城市的特权商人同样可以和外国人贸易。幕府专员是商贸必需的中介，没有中介参与，按日本法律是不能与外国人贸易的。正是在此基础上，条约才可以编入这个方案。“但如果可以让我们的商人免受必须以专员为媒介进行贸易这一规定的束缚，直接与日本商人贸易，那当然是最好的也是最有利的。”^⑪按西博尔德所说，这些似乎都是必要的，日本政府无论如何都不会同意在其他基础上与俄国贸易，甚至会规定固定的钱数，与俄贸易不能超出它们限定的范围。在这一点上，日本一定会坚持让俄国货物额不能超过5万小判即25万俄国银币，这与荷兰人一样。“由于不了解当地规定，我们不能说上述推断一定准确无误，但是全部的努力都是为了不让我们在日本的贸易受到如此多的束缚。”^⑫

第十一点提到，日本的全部文化产品都将由身处日本国的俄国属民以赠礼方式获得。对于其他商品和货物，每年的首要需求就是确定详细税率^⑬。

第十二点提到，在各方面事务上，涉及俄国属民的都是比较重要的。不管与日本人有任何分歧和争论，俄国领事都将与当地政府即直接与总督或其接班人接洽，即使事件很普通^⑭。

“释义”作为沙皇训令的补充，体现出俄国

对签订贸易协定的极大期望，对取得过大商业利益的荷兰模式的垂涎和试图效仿，同时又对日本专员的“监控”感到担忧。由此可见，俄国想获取的经济利益是远远高于政治利益的，这也符合资本主义时期资本积累的普遍规律。俄国脆弱的资本主义受自身实力掣肘，在它通过百余年寻找而发现的新土地上，惯用的武力征服不能奏效时，也会被迫满足于通商。马戛尔尼使团访华前，英国东印度公司伦敦总部秘书长科布这样描述英中关系，“没有任何政府会如此可笑地想象，经过漫长海途劳顿的士兵会在受到如此众多人民保卫下的国家冒险进行征服活动，不管这个民族可能被设想得如何缺乏英勇”^⑮。这个描述同样适宜于此时的俄日关系。对于日本这样一个遥远而久叩不开的“顽石之国”，通过外交手段是达成目标的唯一选择，这也是俄国社会的舆论主流。可见，19世纪中期俄国急剧膨胀的经济扩张主义在日本的“落地”，是资本主义发展的内在要求，经济利益高于政治利益原则的出笼顺应了俄国资本对亚洲市场的渴求，反映出俄日协约所带有的妥协特征。

俄国使团到达长崎之前，俄国在库页岛发现煤层的重磅消息已然引起国际关注^⑯。普提雅廷担心美国会抢先占领，便于8月18日派“东方”号“实际占领”库页岛。很快，普提雅廷计划提出，两国沿拉彼鲁兹湾划界，保留择捉岛和以北所有岛屿归俄国所有。拉彼鲁兹湾位于北海道与库页岛之间，这意味着，普提雅廷已明确提出对库页岛的主权主张。

普提雅廷出航日本是俄日关系在维持40年稳定之后的重启、强化与延续。在条约签订前的一个半世纪里，俄国采取主动的、区别于征战的“和平”手段，努力接近日本。尼古拉一世治下的亚洲事务委员会专注日本事务，在强化对日政策的同时，始终延续着彼得一世开创的对日方针——和平推进、友好通商、避免对日采取恶意态度。由于对日国策的一贯性，俄日关系的量变在持续、平稳当中行进，这是两国最终能够缔约的力量源泉和必要途径。当能量聚集到一定程度时，在适当的主客观条件下，俄国的对日策略必

将发生适应性的深刻调整，导致蕴含的历史基因爆发，引领俄日关系走向新的轨道。

三、《条约》签订的外交博弈

几乎同时“降临”日本海岸的俄、美、英三国使日本幕府意识到，西洋已经不是“假想敌”，而是“现实敌人”，西洋使团不是偶然行为而是必然趋势。曾经“像鸵鸟一样深埋沙丘”的幕府，为“不损坏国体”，必须“顺势”应对西洋冲击。

俄日谈判分为两阶段：“长崎谈判”(1853年10月至1854年1月)与“下田谈判”(1854年11月至1855年2月)^{[38][110-154]}。从长崎谈判中断到重启下田谈判时隔近一年里，《日美亲善条约》与《日英亲善条约》相继签署。从普提雅廷第一次抵长崎到最终缔约耗时一年又七月，相较之下，俄日谈判无疑是艰难而漫长的。基于幕府将“土地问题与军事防御联系起来”的考虑，日本以避战、保全国体为宗旨，采取推诿、拖延的“延宕”之术，既不明确答复也不立刻拒绝。面对俄国的强势要求，日本实行“有限开国”“有限贸易”对策，纵然是幕府将军曾支持的“攘夷大号令”与“内战外和令”，显然已不符合情势之需。筒井政宪认为，西洋实力远在日本之上，日本恢复国力之前应与之贸易，以“延宕”换取时间来加强松懈的海防^[39]。尽管没有应战意愿，但在他看来，海防实力能够成为“弱国”日本对外应战的筹码。这是作为俄国应接挂的筒井对日本国力的客观判断，造就了日本的冷静与慎重，促成幕府与列强在一定程度上的等距离外交^[40]。

(一) 拖延中的长崎谈判

普提雅廷首先抛出库页岛、择捉岛及以北岛屿都属俄国的立场。俄方认为：“日本以北的库里尔群岛包括萨哈林岛自古就属于俄国，完全处于俄国管辖之下。有千岛人和部分日本人居住的择捉岛也属此岛群。俄国手工业者自古在此已有聚居村落。”^[45]实际上，此时的库页岛处于俄国“实际占领”状态^{[30][35]}。对此，日方援引涅维尔斯科伊为掩人耳目而提到过俄国无意扩张疆域的信件，要求俄军从住有日本渔民的库页岛南部撤出，并表示出对千岛群岛全岛的占有意图。俄国

就此试图说服日本同意通商，要求开放江户和虾夷地两处并制定通商规则。日本答复，因国内手续繁杂，需要三五年才能决定^{[38][123]}。这明显是日本的拖延节奏。

在长崎的后期谈判中，俄方抓住日方复信中“不应取古例以律今之事”询问，日方是否转变为允许通商的立场。日方以“将军换代”为由推说不能答复。涉及择捉岛，川路圣謨说，当年在释放戈洛夫宁时俄日曾有协议，择捉岛归日本，岛上设有日本警备所。另外，库页岛南部属日本领土，至今仍有日本哨所和几个渔夫家庭。普提雅廷则回应：“俄国人是最早到访择捉岛的，且在岛上有聚居点，后来日本人才搬到这里。据我们理解，这种迁居尚不足以给你们统辖该岛的权利。”^[46]他继续辩称，“向萨哈林岛派遣俄国士兵是因为当地居民欢迎俄国统治，并无觊觎日本属地之意。”^[47]川路紧追不舍，“俄国既然无领土野心就应该从库页岛全部撤军。”^{[41][278-280]}眼见日本态度愈加坚决，普提雅廷试探着表示，如果同日方划定国界，就立刻撤军。日方马上提出以北纬50°为界划分库页岛。普提雅廷答复，“萨哈林沿海居民自古就生活在沙皇庇护之下”，以此断然回绝日本，提出至少以北纬48°划分。日方拒绝。双方争执不下时，普提雅廷指出，划定国界是建立相互贸易的基础，应立即决定。川路这时不得不承认，日本实际上不了解库页岛的情况，须待时日详细调查后再与俄协商^{[41][278-280]}。日方再次否决和拖延了俄国的建议。

事实上，普提雅廷早就接到沙皇指示，两国在择捉岛与得抚岛之间划界。谈判初期，他之所以抛出择捉岛归属俄国一辞，纯属谈判技巧，以攻为守、以进为退，迷惑日本。择捉岛也是普提雅廷试探日本的棋子，隐藏目标是俄国正在实际扩大占领库页岛。普提雅廷巧妙地将库页岛划分捆绑上国界划分问题，再将国界划分捆绑上贸易协议。不得不说，普提雅廷灵活贯彻尼古拉一世的训令宗旨，发挥了应有的自主权。他的应对策略在以下两份文件中表露无疑。在1854年1月21日给外交部亚洲司司长Л.Г.谢尼尼文的147号紧急密报中，普提雅廷回复了在上海收到的占领库页岛的2576号文件：“我在派‘东方’号去考

察南萨哈林、调查日本人将住地向北扩张多远时，命令队伍保持极度警惕，莫引起日本怀疑。帆船回来后，我从涅维尔斯科伊上尉那里得到俄国人占领阿尼翁湾的消息……正是现在，我断定外交部指的并不只是阿尼翁湾本身。我认为，如果迎头遇上日本抵抗，应该假装这只是暂时性的……直到俄日国界确定下来。”^⑯在 1854 年 2 月 27 日给谢尼雅文的 175 号紧急密报中，普提雅廷写道：“我将坚持让日本聚居点留在俄国的阿尼翁湾，申明我们对择捉岛的权利，直到协议方案至少大体上获得通过。”^⑯也就是说，日本要得到库页岛，就必须先商定千岛上的国界划分，而要确定国界上的领土主权，就必须商谈贸易。

日本的拖延实则为谈判寻找有利筹码。日本曾在外交招待会上表示，只要日本批准与外国通商，就批准与俄国通商，条件完全一样^{[38](158)}。日本这种不答复不拒绝的姿态反映出面对西洋来航时的矛盾心理，既想继续维系祖法、维护主权，又担心会招致战争危险而致国体倾覆。临近长崎谈判时，发生了一件直接影响谈判进程的战事——克里米亚战争。1853 年 10 月 16 日，俄国向土耳其开战^[42]。巴尔干战场远离俄国政治中心，尽管俄国已有多次对土作战经验，但补给仍是限制俄军的沉重绊脚石。虽然俄国外交困境当时暂未被幕府知晓，但客观上却为谈判中的日本创造了有利时机，日本的推诿、拖延战术在俄国使团身上发挥了事半功倍的效用(拖延战术并未对美、英使团有明显效果)。所以，整个长崎谈判中，普提雅廷面对日本的反诘、故意拖延，始终采取“十分郑重礼貌”的“谦虚之态”，这一度获得日本官员好感，“19 世纪前半期的日本对俄国的认识毋宁说是非常正面的”^{[38](190)}。

日美、日英谈判同样影响到俄日谈判。1854 年 2 月，佩里用武力逼迫日方签署《日美亲善条约》，成为欧洲国家的范例。同年 10 月 2 日，斯特林率英舰闯入长崎，日本试图利用英国牵制俄国，遂签署类似于《日美亲善条约》的《日英亲善条约》。此时的日本已无力再将俄国拒之门外。

(二) 无奈中的下田谈判

当克里米亚战争从欧洲蔓延到太平洋上时，已形成英法舰队联合驱逐俄舰之势^[43]，日本的北

方水域变成战场。1854 年 10 月 9 日，普提雅廷乘坐“季阿纳”号驶达箱馆(“帕拉达”号已无法行驶)后再抵下田，日本现在已得知俄正与英法交战。关于条约谈判，日本建议参照日美条约办理。11 月 3 日，俄日双方在有明显分歧的情况下重启中断一年的谈判。普提雅廷建议先谈通商，日本要求先谈国界。因为俄方已得知美、英与日本签订条约，急于与美英分沾利益。他在听完日方“通商渐进论”后，陈述了俄国有派驻领事以及选择开港地点的具体建议，特别提到下田港风急浪高，不适合作为开港地，如果大阪不成就开放兵库，兵库不行就开放滨松^{[41](217)}。川路当天记录到，“猾虏屡屡词穷，照此形势料可轻取之”^{[41](220)}，相当乐观地估计谈判走向。然而第二天，大地震引发海啸袭击下田，谈判被迫中断。“季阿纳”号严重损坏，不大修则无法安全回国^[44]，普提雅廷陷入更大困境^{[41](239)}。

由于俄国在亚洲战场的补给异常艰难，普提雅廷要求开放箱馆与大阪两个港口，日本坚持“开港地应当仅限于偏僻地区”而以下田为开港地，并以“锁国持续二百年，现已开放至此状态”请求俄国谅解。普提雅廷并未过多纠缠于港口地点与数量，而把重点投入在开港地补充急需物资、允许“金银和物品自由交换”的讨论上^[45]。美、英两国与日签约，给俄国提供前例和口实，俄国可以享受最惠国待遇和领事裁判权。幕府担心外国人常驻国内后会影响其统治，既反对俄日商品自由买卖，又反对俄国人携带家属赴日和做礼拜，因此全力反对设置领事馆。俄方提出，派驻领事官员主要是为管理来日的俄国国民，特别是防止走私鸦片。面对日本的拖延答复，普提雅廷认为领事馆条款是缔约不可或缺的主要内容，但为了尽快达成开港条款，同意互相派驻官员行使同等权力，即相互的领事裁判权。

1855 年 1 月 26 日，俄、日两国在下田长乐寺签约。普提雅廷在之后的 7 月 18 日给外交部的 1786 号密报中写道：“军舰最终毁灭后，我非常担心日本人会趁人之危，完全拒绝缔约，或者至少想在确定国界上表现出新的野心。”^⑰这句话足以见证当时俄方的无奈。他继续写道，“在占领萨哈林的新地方时，为巩固俄日友好关系，绝

不能住在阿尼翁湾，且要完全避开日本夏营和冬营。”^②可见，俄方为达成开港目的，甚至愿意让出阿尼翁湾为日本所有。上文已经提及，在阿尼翁湾住着几个日本渔夫，因此，条约中的库页岛问题如此措辞：不划分界限，按照迄今为止的办法处理。

条约有正文九条，附录四条。正文包括：第一条，俄日永结友好。第二条，俄日以择捉岛与得抚岛之间为界，库页岛暂不划分、保持现状。第三条，日本开放长崎、下田、箱馆三个港口，俄船可在此补给，日方收取金银，如缺少金银可以物品代替。第四条，互助漂流民。第五条，俄船进入下田港时，可以以金银物品换取所需物品。第六条，如遇不得已之事态时，俄国可以向箱馆、下田内的一处港口派出官员。第七条，如遇需要商议之事，日本政府将认真研究处理。第八条，俄人在日逗留期间，以及日人在俄逗留期间，双方不得怠慢或限制对方人员行动。但若有触犯对方国家法律时，应按照本国国法处置。第九条，因两国互为近邻，日本今后给予别国的优惠待遇同样适用于俄国^③。附录包括：①(针对第三款)每处港口设公墓；②(针对第五款)货物交换在公家指定的专营店进行，由幕府官员监督；③(针对第六款)领事馆选址由日本政府决定；④(针对第九款)对俄国的最惠国待遇不需要任何谈判^[46]。

(三) 谈判达成妥协的原因

《俄日下田条约》是博弈的双方在谈判中相互妥协、和解的产物。达成妥协的历史动因已在前文中论述，归纳其现实原因，主要在于：①有着丰富征战经验、深谙外交手腕的俄国君臣通晓国际格局和东亚变势，尽量利用于己有利的因素，充分把握美英武力威胁日本、扩充条约体系的难逢时机，坐收渔人之利。1854年佩里舰队、斯特林舰队的恫吓对幕府形成压迫，强敌压境下的锁国体制摇摇欲坠。俄国马上掌握机会，虽未以武力威胁，但借力发力，以日美条约的先例为说辞，说服幕府顺势而为加快谈判步伐。“被公认‘老练’的川路在军事和外交经验丰富的普提雅廷面前，不得不承认最惠国待遇。”^[40]②克里米亚战争是催化剂，俄日整个谈判几乎都伴随着战争脚步。无论是1853年10月战争爆发，还是1854

年4月战场扩大后，薄弱的俄国海军几度陷于无法回转之颓势。战争余波鞭及日本，普提雅廷在谈判中始终紧绷神经关注战况，以尽快结束谈判、尽早缔约后安全回国为底线。他在日记中写道：“在俄国陷入战争、水手们由于‘季阿纳’号覆没而被动危急时，不能达成更好的协议了。”^[47]③18世纪末欧美船只频繁出没于日本沿岸。四面楚歌的日本对采取与欧美列强完全相反的“和平友好”态度的俄国抱有一定好感，希望获得俄国协助以缓解虎狼环视压力。自1853年佩里首闯浦贺港后，“联俄抗美”就成为中下层武士的主流意见。④始自18世纪初的俄国不断南下在深化日本的俄国观、世界观的同时，激发出日本务实的安全利益观，“锁国祖法”因合理性丧失而逐渐瓦解。日本审时度势地判断并有效利用国际形势，在外交上掌握一定主动权，以签约、止戈来自我保护。如果说“锁国祖法”使日本错失自主有序打开国门的历史机遇，那“签约止戈”则是历史对日本的现实弥补。

《条约》是俄日两国在新环境中通过外交途径、按照西方准则来解决纠纷的开端，体现出两种国家理念的相互容忍与接纳，标志着两国近代性质外交关系的开始。《条约》也成为俄日岛屿问题的最早国际法根据，日本至今仍强调该条约中千岛划界的有效性。

四、《条约》的实质与影响

历史就像是一幅卷轴，细节会有助于更好地解读它，所以历史需要细节。通过对俄日关系演变的历史回顾、对双方角力和对主导国俄国战略考量的具体呈现，笔者认为，《俄日下田条约》作为两国第一个双边条约，其积极性就在于妥协性，即双方努力争取各自国家利益的最大化，而不是实现一方对另一方的绝对胜利。妥协的特征深刻揭示出《条约》的实质和早期俄日关系的本质，预示着两国关系在东北亚地区更加复杂的未来发展进程。

(一) 《条约》的基本特征

疆域协定具有最大的妥协性。从当时状况分析，日本占尽地利天时。从俄国国家利益与基本

战略来看，俄国传统的核心利益集中在欧洲、近东和中亚；在远东的关键利益是中国，不是日本，清政府的顽强抵抗才使俄国被迫向北迂回而取道日本。这客观上促使俄帝国态度的“软化”。谈判之际，俄国正陷于克里米亚战争泥潭，在远东需要防备以中国东南沿海和北太平洋为基地的英法舰队的袭击，巨大海啸更是被日本誉为上天眷顾的“神风”。再加上双方对岛屿的初级认知和有限概念，能如此顺利完成边界划分，对两国都有重要意义。

对俄国而言，首先，不容许英法在战争中使用日本领土，确保了日本在克里米亚战争中的中立。此时的欧洲，近代战时国际法已经形成，海战由海盗般行径走向文明时代。虽然抓捕敌国船是海战的常规作战方法，但此时在日本港内抓捕俄国船是违背常理的。其次，相对于欧洲腹地的传统利益带，在东方“力所不逮”的俄国追求的是在远东建设一个永久性的稳固后方，获得港口以保障资金和粮食供应。此时的领土争端反而处于俄国战略中相对次要的地位。可以说，俄国为获得日本的开埠通商许可作出了暂时的领土让步，俄国的政治(领土)利益服从了经济利益。“俄国以让步的方式提议将岛屿分成两半，甚至同意承认阿尼翁南边部分岛屿归日本所有……但后来被迫放弃这座岛(库页岛——作者注)。”^{[48](23)}可见，对侵略成性的俄国来说，放弃库页岛南部与择捉岛是俄国对日本做出的“巨大让步”。对日本而言，首先，幕府更加关注的是“本虾夷地”(北海道)的命运，而不是“北虾夷地”库页岛，因为“当时形势下北海道随时都有可能被俄国占领”^{[38](225)}。日本的基本立场是保证领土完整性，条约确保了本虾夷地作为防御屏障的紧迫性，以本虾夷地为依托坚守日本国界是幕府当时最为现实的策略。幕府于谈判期间(1854年3月)派往库页岛实地调查的目付堀利熙与勘定吟味役村垣范正建议“为加强防卫，保留下松前藩领地，其余全部改为幕府直辖领地”^{[38](225)}，并认为，“此时已无可能与俄国竞争并确保阿依努人服从日本”^{[38](226)}。其次，条约订立之后，幕府能更加积极、自由地开发和管辖北方岛屿而不受人掣

肘。稳定的北方既能让幕府腾出手来解决日益加重的国内问题，又能借此寻找打开国门的“合法性”以缓解垂危的统治危机。

对领事裁判权的单方确定是不平等条约的典型特征，但下田条约中的领事裁判权是双向、对等的。这是妥协性的另一个表现。不管是俄国人在日本，还是日本人在俄国，双方均不得限制对方人员的行动。若触犯所在国法律，违法人员均按照本国国法处置。即，俄日之间发生纠纷时应在法律上给予对等待遇。这意味着，俄国对日本属民开放，就像日本对俄国属民开放一样^[49]。虽然条约中并无日本向俄国派驻领事条款，但已明确规定依据日本法律处理日本罪犯。在公认的不平等条约《日美亲善条约》中，对违法者依据本国法律进行处罚的规定，仅仅适用于在日本触犯法律的美国人，这与《俄日下田条约》明显不同。在列强疯狂殖民东方的狂潮下，俄日关系中出现违反常例的“对日优惠条款”，从侧面证明俄国以通商为要、其他次之的“不惜代价”的让步方针。吉贺谨一郎在日记中写道：“与美国不同的是，俄国不仅需要救助漂流民和获得燃料、淡水，还急需向‘东疆’不毛之地供应后勤物资，故需要派驻官员与日本谈判并据理力争。”^[50]和田春树也认为，在19世纪中叶西方国家和日本签订的条约中，“互相使用领事裁判权、各方面保持平等的其他例子是不存在的”^{[48](164)}。

结合1853年俄国政府对普提雅廷训令的“释义”来看，日本在贸易领域的权利并没有被损害，反而带有垄断权。首先，俄国在日本进行贸易具有限制性，只能在日本官员的监督下按日方意愿进行。日本港口的贸易额也有限制，且征收高额关税，日本官员拥有的干涉权使得对外贸易的垄断实际上一直存在，这使俄国获利十分有限，“根本无法圆满解决太平洋属地的粮食储备难题”^[51]。其次，俄国传统工业中心距离日本非常遥远，苦寒的西伯利亚也没有合乎要求的基础设施，在太平洋上“它连一个能够保障其经济利益的船队都没有”^[52]，这就导致货物送达日本的成本非常高。19世纪中叶，作为欧洲二流强国的俄国商品在日本市场根本无力与其他更发达的西方国家竞争。

因此，俄日两国贸易本身并没有大幅增长，甚至可以说，面临一系列政治难题的俄国，在远东的经济利益退步了。

鉴于疆域协定的妥协性、领事裁判权的相互性以及日本贸易的垄断性，俄国所拥有最惠国待遇这一条款的象征意义远远大于实际意义，俄国只是形式上享有与他国一样的特权。本来，最惠国待遇是俄国借助《日美亲善条约》的先例而顺势同日本谈妥的条款，也应该是对俄国最有利的。但最惠国待遇原则在最初几年里并没有给俄国带来实际好处，其优势后来才显露出来。《俄日下田条约》规定俄国有权以金银物品换取所需物品，但俄国比任何列强都亟需贵金属储备，日本贸易的垄断使得此项条款成为在当时条件下能真正发展俄日商贸的唯一前提条件。为争取与英美大国同等的、相比肩的身份与地位，赢得在太平洋地区的平等利益，俄国从“不太实惠”的最惠国待遇出发，在1857年10月与日本签订含28个条款的补充条约。根据补充条约，日本对俄国开放另一个港口以代替下田。这从俄国角度来看更便利。条约仍对俄船数量和贸易额进行限制、保留高额关税(35%)，但废除了以日本官员为中间人的制度。1858年8月7日，同样是循最惠国待遇原则，《俄日贸易通航条约》于江户签署，双方贸易的所有限制和高额税率终于被取消。自此，俄国才开始获得最惠国待遇原则带来的“远东实惠”。

日本学者高仓新一郎的观点或许是对《俄日下田条约》的最真实总结：“俄国坚持认为择捉岛最早是属于俄国的，而日本则坚持认为所有岛屿都属于日本”，“俄国最终还是将择捉岛让日本管辖，条件是日本同意开放贸易”^[53]。但日本以俄国商品竞争力低为由，把重点放在与其他国家发展贸易上^[54]。因此，两国贸易在数年内一直非常低迷。这也间接证明条约的相互妥协性。

综上所述，日本在领土与贸易方面并未因条约丧失权利和收益，而俄国也未得到超出实力之外的过多实惠，双方做出的合理让步皆是服从于最高国家利益的特定诉求，符合各自的国家地位。故，“日本受压说”和“俄国受压说”两种

观点都具有片面性，不尽全面。《俄日下田条约》应该是双方综合考虑诸多因素后各取所需的“双赢”条约。

(二)《条约》的实质和俄日关系的本质

有《日美亲善条约》《日英亲善条约》范例在先，《俄日下田条约》更为简练。文本虽短，尺幅之间却是气象万千，其包含的内容、传达的讯息，足以成为揭示条约实质和注解俄日关系本质的一扇窗口。

享国千年的拜占庭帝国灭亡后，继承其遗产的俄国沿袭拜占庭在地缘政治中的双重定位：国家战略兼顾欧亚，服从“欧亚主义”要旨，东顾西盼，就像国徽上的双头鹰一样左右觊觎。俄国在东方的进与退、与东方的亲与疏^[55]，正是近代以来国际局势在东北亚的折射。《俄日下田条约》既是俄国以土地换港口、以政治利益换经济利益的无奈之举，又是挟美英之余威的巧攻之举。陷于欧洲征战的“泥足巨人”俄国，到达日本时已是强弩之末。俄国与美英列强围绕“东方问题”的明争暗斗日趋白热化，拥有东西漫长交通线的俄国并无更多胜算来经营远东，只能跟着列强趁火打劫一番，在维护既得利益的同时与各国利益均沾。日本开放港口使其成为俄国迈向太平洋的便捷通道，这是俄国由设防要塞和贸易站点构筑殖民网络的向东延伸。鉴于太平洋上孱弱的防御力，沙皇担心美、英、法利用俄日关系的任何缝隙挑起冲突，这样一来，这些强国的远东征服计划的实现就会简单化，严重牵扯俄国对巴尔干半岛、近东和中东的注意力。一旦日本被美、英、法等国征服，就会威胁到俄国的远东边境并削弱俄国在太平洋的地位。因此，俄国需要拥有一个忠实的邻国日本，不会效仿西方各国的反俄政策。在俄国对外战略中，东方始终没有取得与西方对等的地位，更多只是俄国在西方碰壁后寻求心理慰藉与利益补偿的“疗伤”场所，而这又无疑导致了东方对俄国的排斥与猜忌。

日本虽然游离于中国朝贡体系外，但它自古就是东亚秩序的一员。《俄日下田条约》的签订是日本为避免军事冲突、希望和平解决争端的近代外交尝试，是幕府逐渐放弃锁国而主动的对外

探索。二百多年前，日本用“锁国”来阻挡西方持“宗教”旗号的企图，继续以东方儒释道文化来稳固统治基础。二百余年后，日本用“开国”来阻挡西方的坚船利炮，以西方模式来维护旦夕将倾的统治大厦。同样是因应西方冲击，但方式却大相径庭。二百余年来日本不断吸收外来文化，受其岛国性征所影响的传统文明也不断完善，使其外交模式发生重大转变，激发日本从“锁国攘夷”到“和亲攘夷”再到“和亲开国”^[56]。这是处于亚洲中华秩序边缘、东亚局部秩序中心（日本在本国周边构建了日式中华秩序）的日本在西力东渐之下的方向选择，是日本“慎重”的现实主义在潜意识中的蠢动。持续不断的“西洋来袭”体现出西方希望拆除东西壁垒，让整个东方充当其附庸、纳入其条约体系的意图。被二百余年危机感培养和造就的日本以西方为假想敌，渐次认清“强食弱肉”丛林法则的资本主义强权社会，顺势而为是这种心情的最好表达，最终避免了沦为殖民地的命运。

作为俄日首个双边条约，《条约》深刻反映出早期俄日关系的本质。俄国主导的早期俄日交往是工业革命后西方因素进入亚洲的重要步骤，是欧洲秩序被带入亚洲的一环。从更宏观的角度来看，它是近代国际秩序一步步摧毁并取代亚洲华夷秩序的过程，是历史发展的必然趋势。日本以此为肇始，从旧体制走向新路途，从受容走向突破。日本萌生出来的“让日本成为同样强国”的使命感，促使它走上以邻为壑、与东亚邻国迥异的应变之路——后来效仿了西方，以一己之力冲破西方对东方的整体设想。

（三）《条约》的深远影响

《条约》在法律上承认了俄国在东方的外交实践，俄国基本实现经略远东的计划，日本成为俄国的太平洋基地，远东暂时稳定使俄国加大国内改革力度。1861年，农奴制被废除，亚历山大二世致力于将绝对君主制改造成君主立宪制的计划。1858—1864年间，俄国追随欧美列强之侧，强迫清政府签订《瑷珲条约》《北京条约》及《勘分西北界约记》，继续在东方巧取豪夺。

“朝廷政治化的契机是外来压迫”，西方冲击引发并加剧日本内部矛盾的同时带来社会转

型的机遇。幕府主导的安政改革、文久改革和庆应改革作为先期探索，为明治维新提供了近代化的践行经验^[57]。1867年末明治政府成立后，对内推行富国强兵、殖产兴业等改革措施，寻求的对外目标则真实反映出其国策的基本取向，从“保护皇国，必可与万国并立”“挽回国威”到“开拓万里波涛，宣布国威于四方”“与海外各国并立”等提法，在幕末和明治初年的文件中被反复重申。

几乎在同一时期加速走上资本主义快车道的俄国与日本，被《条约》掩盖的矛盾很快凸显。“库页岛暂不划界”与千岛岛屿划分是条约埋下的一个隐患，双方的妥协只是应变反应，因为“对于当时的俄日两国来说，的确没有更好的办法了”^{[38](239)}。一旦双方力量对比和国际形势再次巨变时，隐藏的问题便浮现出来，从而为俄日矛盾的激化提供可乘之机。

《俄日下田条约》既是早期俄日关系的结果，又是新时期“俄日近代性质国家关系”的开始，是让步、妥协的产物。既然是妥协之物，必然带有一定的不彻底性和局限性，两国将为冲破条约束缚而自觉行动，因此俄日关系接下来的发展是相当复杂的。俄国的帝国利益更多转移到远东后，日本也加强了自身实力，双方必将在东北亚的有限利益空间内展开争夺，在太平洋上掀起更大的旋涡。这开启了俄日关系的又一个历史阶段。

注释：

- ① 李若愚、程浩两位学者运用珍贵的日本史料，率先突破传统观点，从日本考量出发认为该条约相对平等，这给笔者以极大启发。参见：李若愚.试论日本“锁国”政策对19世纪以前日俄关系的影响.西南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 2014(1): 159-166; 李若愚.近代初期日本的对外认识与领土观的形成.日本研究, 2013(4):112-116; 程浩.幕末俄日军事冲突与《下田条约》.长春: 东北师范大学, 2011. 以K.E.契连夫科为代表的部分俄国学者在21世纪也表达出异于传统的观点，认为《俄日下田条约》与同时期签订的日美、日英条约存在本质区别。他辨析，“普提雅廷与日本首轮谈判始自1853年10月，是在《日美神奈川条约》缔结之前，而且，《神奈

川条约》具体内容和细节条款一开始对俄国人保密”。他还指出：“与美国人行动有所不同，俄日谈判从一开始就没有伴以俄国武力相威胁，所以并不具备损害日本主权的强迫性质。”参见：ЧЕРЕВКО К.Е. Россия на рубежах Японии, Китая и США, 2-я половина X VII – начало X X I века. М: Институт русской цивилизации, 2010.

② 参见俄帝国外交档案馆第10—17全宗5目(1808年)61号532卷第11页：АВПРИ.Ф.Главный архив.10—17.Оп.5.1808 г.№ 61.Д.532.Л.11. АВПРИ: Архив внешней политики Российской империи。

③ 实际上，东西虾夷被收归天领的情况并没有持续下去。1821年，幕府重建松前藩恢复对虾夷地的原有管理体制，幕府再次对虾夷地实施直辖，正是《俄日下田条约》签订的1855年。

④ 参见俄罗斯国家海军档案馆海事部全宗第1目2498卷第165—167页：РГАВМФ.Ф. департамента морского министерства.Оп.1.Д.2498.Л. 165—167. РГАВМФ: Российский государственный архив Военно-Морского Флота。

⑤ 参见俄帝国外交档案馆第101全宗1目(1852年)34号261卷第72页：АВПРИ.Ф.Главный архив.101.Оп.1.1852 г.№ 34.Д.261.Л.72.

⑥ 1844年，荷兰国王威廉二世给幕府送来劝说开国的亲笔信，谈到欧洲形势变化和欧洲势力进入亚洲，特别提到中英关系，劝诫幕府放弃锁国，对外打开门户，但遭幕府拒绝。1852年，荷兰获知美国的对日派遣计划后马上向幕府递送《荷兰风说书》，提议缔结日荷条约，再次遭幕府拒绝。

⑦ 这卷《释义》现存于俄国对外政策档案馆，1991年被引入俄国学术领域。

⑧ 参见俄帝国外交档案馆第1—9全宗8目17卷二册第214页：АВПРИ.Ф.Главный архив. 1—9. Оп.8.Д.17.Ч. II .Л.214.

⑨ 参见俄帝国外交档案馆第1—9全宗8目17卷二册第214页：АВПРИ.Ф.Главный архив. 1—9.Оп. 8.Д.17.Ч. II .Л.214.

⑩ 参见俄帝国外交档案馆第1—9全宗8目3卷第43—57页：АВПРИ.Ф.Главный архив.1—9.Оп.8.Д.3.Л.43—57.

⑪ 参见俄帝国外交档案馆第1—9全宗8目3卷第227页：АВПРИ.Ф.Главный архив.1—9.Оп.8.Д.3.Л.227.

⑫ 参见俄帝国外交档案馆第1—9全宗8目3卷第227页：АВПРИ.Ф.Главный архив.1—9.Оп.8.Д.3.Л.227.

⑬ 参见俄帝国外交档案馆第1—9全宗8目3卷第228页：АВПРИ.Ф.Главный архив.1—9.Оп.8.Д.3.Л.228.

⑭ 参见俄帝国外交档案馆第1—9全宗8目3卷第228页：АВПРИ.Ф.Главный архив.1—9.Оп.8.Д.3.Л.228.

⑮ 参见俄帝国外交档案馆第1—9全宗8目17卷二册第53页：АВПРИ.Ф.Главный архив.1—9.Оп.8.Д.17.Ч. II .Л.53.

⑯ 参见俄帝国外交档案馆第1—9全宗8目17卷二册第94页：АВПРИ.Ф.Главный архив.1—9.Оп.8.Д.17.Ч. II .Л.94.

⑰ 参见俄帝国外交档案馆第1—9全宗8目17卷二册第94页：АВПРИ.Ф.Главный архив.1—9.Оп.8.Д.17.Ч. II .Л.94.

⑱ 参见俄帝国外交档案馆第1—9全宗8目17卷二册第110页：АВПРИ.Ф.Главный архив.1—9.Оп.8.Д.17.Ч. II .Л. 110.

⑲ 参见俄帝国外交档案馆第1—9全宗8目17卷二册第113页：АВПРИ.Ф.Главный архив.1—9. Оп.8.Д.17.Ч. II .Л. 113.

⑳ 参见俄帝国外交档案馆第1—9全宗8目17卷二册第115页：АВПРИ.Ф. Главный архив.1—9. Оп.8.Д.17.Ч. II .Л. 115.

㉑ 参见俄帝国外交档案馆第1—9全宗8目17卷二册第121页：АВПРИ.Ф. Главный архив.1—9. Оп.8.Д.17.Ч. II .Л. 121.

㉒ 参见俄帝国外交档案馆第1—9全宗8目17卷二册第231—232页：АВПРИ.Ф. Главный архив. 1— 9.Оп.8. Д.17.Ч. II .Л.231—232.

参考文献：

- 平岡雅英. 日露交渉史話[M]. 大阪: 筑摩書房, 1944.
- 吉田嗣延. 北方領土[M]. 東京:時事通信社, 1962.
- 日本外務省. 日露交渉史[C]. 東京: 原書房, 1979.
- 村山七郎. クリル諸島の文献学的研究[M]. 京都: 三一書房, 1987.
- ФАЙНБЕРГ Э Я. Русско-японские отношения 1697—1875 гг[M]. Москва: Издательство восточной литературы, 1960.
- ПЕТРОВ Д В. Япония в мировой политике[M]. Москва: Международные отношения, 1973.
- КУТАКОВ Л Н. Россия и Япония[M]. Москва: Наука, 1988.
- 周启乾. 日俄关系简史(1697—1917)[M]. 天津: 天津人民出版社, 1985.
- 崔丕. 近代东北亚国际关系史研究[M]. 长春: 东北师范大学出版社, 1992.
- 黄定天. 东北亚国际关系史[M]. 哈尔滨: 黑龙江教育出版社, 1999.
- 李凡. 1855年前的俄日两国关系[J]. 南开日本研究, 2015(1): 198—208.
- 李凡. 论俄日1855年缔结《俄日友好条约》[J]. 外国问题研究, 2015(3): 3—8.

[13] 宋成有. 东亚变局视域下日本吞并琉球国的再审视[J]. 上海师范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 2019(5): 122—132.

[14] 张之毅. 十八世纪东方外交与西方殖民主义[J]. 世界历史, 1989(2): 38—46.

[15] ЗНАМЕНСКИЙ С В. В поисках Японии. Из истории русских географических открытий и мореходства в Тихом океане [M]. Владивосток: Книжное дело, 1929: 3.

[16] ПОЛОНСКИЙ А С. Курилы [J]. Записки Императорского Русского географического общества по отделению этнографии, 1871(5): 105—120.

[17] РИКОРД П И. Записки флота капитана Рикорда о плавании его к японским берегам в 1812 и 1813 годах и о сношениях с японцами [M]. Санкт-Петербург: Типография Эдуарда Веймара, 1875: 102.

[18] ЧЕРЕВКО К Е. Россия на рубежах Японии, Китая и США, 2-я половина X VII-начало X X I века [M]. Москва: Институт русской цивилизации, 2010: 63.

[19] ГОЛОВНИН В М. Записки в плену у японцев в 1811, 1812 и 1813 годах и жизнеописание автора [M]. Санкт-Петербург: Типография Н. Гречи, 1851: 25.

[20] СГИБНЕВ А С. Об обучении в России японскому языку [J]. Морской сборник, 1868(12): 11—21.

[21] СГИБНЕВ А С. Об обучении в России японскому языку [J]. Морской сборник, 1869(7): 78—88.

[22] 秋月俊幸. 日露関係とサハリン島: 幕末明治初年の領土問題 [M]. 東京: 筑摩書房, 1994: 109.

[23] 木村汎. 日露国境交渉史 [M]. 東京: 角川学芸出版, 2005.

[24] 程浩. 幕末俄日军事冲突与《下田条约》 [D]. 长春: 东北师范大学, 2011: 1—42.

[25] 曹中屏. 东亚与太平洋国际关系——东西方文化的撞击 [M]. 天津: 天津大学出版社, 1992: 96.

[26] 後藤敦史. 開国期徳川幕府の政治と外交 [M]. 東京: 有志社, 2015: 89.

[27] ТИХМЕНЕЕВ П А. Историческое обозрение образования Российско-Американской компании и действий её до настоящего времени [M]. Санкт-Петербург: Типография Эдуарда Веймара, 1861.

[28] БОЛХОВИТИНОВ Н Н. Становление Русско-американских отношений 1775—1815 [M]. Москва: Наука, 1966: 101.

[29] ГРИШАЧЕВ С В. История российско-японских отношений X V I I I -начало X X I века [M]. Москва: Аспект-пресс, 2015: 65.

[30] НЕВЕЛЬСКОЙ Г И. Подвиги русских морских офицеров на крайнем востоке России. 1849—1855 гг [M]. Москва: Нобель Пресс, 2011.

[31] 王晓秋. 鸦片战争对日本的影响 [J]. 世界历史, 1990(5): 92—100.

[32] 小島晋治. 太平天国革命の歴史と思想 [M]. 東京: 研文出版, 1978: 23.

[33] LENSEN G A. Russia's Japan Expedition of 1852—1855 [M]. Gainesville: University of Florida Press, 1995: 131.

[34] ПЕТРОВА О П. Адмирал Е. В. Путятин в бухте Хэда [J]. Советское Востоковедение, 1949(6): 310—319.

[35] 渡辺修二郎. 外交通商史談 [M]. 東京: 東陽堂, 1897: 101.

[36] ЧЕРЕВКО К Е. Памятник японо-русской дружбы [J]. Проблемы Дальнего Востока, 1973(3): 219—229.

[37] 陈士夫, 潘家德. 从要求通商到武力征服: 试析鸦片战争前英国对华政策的调整 [J]. 宜宾学院学报, 2006(2): 31—34.

[38] 三谷博. 黒船来航 [M]. 東京: 吉川弘文館, 2003.

[39] 維新史料編纂事務局. 大日本維新史料第2編 [M]. 東京: 東京大学出版会, 1985: 354—364.

[40] 上白石実. 筒井政憲～開港前後の幕臣の危機意識について [J]. 史苑, 1994, 54(1): 47—59.

[41] 川路聖謨. 下田日記. 川路聖謨文書: 第六卷 [M]. 東京: 日本史籍会, 1934.

[42] СЕМАНОВ С Н, ПОПОВ А А. Крымская война [M]. Москва: Вече, 1999: 69.

[43] МРГОРОДСКИЙ А В. Крымская война на Азовском море [M]. Москва: Международные отношения, 2020: 23.

[44] МАХОВ В Е. Фрегат "Диана". Путевые записки бывшего в 1854—1855 годах в Японии [M]. Санкт-Петербург: Товарищество "Обществ. польза", 1867: 65, 214.

[45] КУТАКОВ Л Н. Россия и Япония [M]. Москва: Наука, 1988: 98.

[46] ГРИММ Э Д. Сборник договоров и других документов по истории международных отношений на Дальнем Востоке. (1842—1925) [M]. Москва: институт Востоковедения, 1927: 52.

[47] ПУТЯТИН Е В. Всеподданнейший отчет генерал-адъютанта графа Е. В. Путятиной о плавании отряда военных судов наших в Японию и Китай. 1852—1855 гг. [J]. Морской сборник, 1856(2): 109.

[48] 和田春樹. 開国: 日露国境交渉 [M]. 東京: 日本放送協会, 1991.

[49] МАРТЕНС С. Собрание трактатов и конвенций,

заключенных Россией с иностранными державами[М].
Санкт-Петербург: Типография Министерства путей
сообщения (А. Бенке), 1902: 49.

[50] 古賀謹一郎. 古賀西使続[М]. 京都: 日本放送協会,
1989:376.

[51] ЛАТЫШЕВ И. Кто и как продает россию: Хроника
российско-японских территориальных торгов (1991—
1994 гг) [М]. Москва: Наука, 1994:23.

[52] ФАЙНБЕРГ Э Я. Русско-японские отношения 1697—
1875 гг[М]. Москва: Издательство восточной литературы,
1960: 5.

[53] 高倉新一郎. 新北海道史・札幌巻[М]. 北海道:北海道
府, 1970: 56.

[54] ПОПОВ К М. Япония[М]. Москва: Мысль, 1964:416.

[55] 赵博渊. 双头鹰的东方情结——俄罗斯远东战略300年
记[J]. 南风窗, 2005(11): 68-70.

[56] 李若愚. 近代初期日本的对外认识与领土观的形成[J].
日本研究, 2013(4): 112-116.

[57] 宋成有. 从幕末改革到明治维新: 连续性与变异性的
互动[J]. 日本问题研究, 2018(4): 27-33.

Re-examination into *The Shimota Treaty between Russia and Japan* under the changing context in north-eastern Asia

XING Yuanyuan

(School of History, University of Chinese Academy of Social Sciences, Beijing 100102, China)

Abstract: From the beginning of Russia-Japan relations in 1697 to the signing of *The Shimota Treaty* in 1855, the early relations between the two countries experienced evolution of a century and a half. In 1815, after quieting down the military conflicts and resolving the hostage crisis, the two countries tacitly agreed to the concept of border demarcation, which laid a historical foundation for the signing of the treaty. In 1852, the power balance between Russia and Japan was broken with the changes of the international situation, creating real conditions for the signing of the treaty. In the negotiations, the two countries made concessions to promote reconciliation: Russia won the opening of ports and trade with Japan through land concessions, and the political interests were transferred to economic interests, while Japan, on the other hand, protects the whole country by opening up Hong Kong and trade links, and transfers economic interests to political interests. Compromise is a prominent feature of the treaty, which reveals the essence of the treaty and the essence of the early relationship between Russia and Japan. For Russia, the treaty is an expedient of rights and interests in the East due to the lack of power in colonial competition, while for Japan, the treaty is a modern diplomatic attempt to avoid and stop the war. It is an active foreign exploration by the shogunate to gradually give up locking the country.

Key Words: Russia; Japan; Puthiatin; *The Shimota Treaty between Russia and Japan*

[编辑: 苏慧]